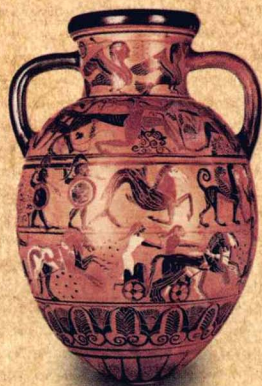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历史学的实践

〔英〕 G. R. 埃尔顿 著
刘耀辉 译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历史学的实践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英〕 G. R. 埃尔顿 著
刘耀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58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的实践/(英)埃尔顿著;刘耀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1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14408-4

I. 历… II. ①埃…②刘… III. 史学-研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865 号

Elton, G. R. (Geoffrey Rudolph),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1967, 2002 by The Estate of G. R. Elton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书 名: 历史学的实践

著作责任者: [英] G. R. 埃尔顿 著 刘耀辉 译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408-4/K · 05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3 印张 182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今天,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的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些人数众多的活跃的学者当中,许多人可能偶尔对他们的技艺进行了反思,但只有少数几个人把他们的思想公诸于众。在这方面,虽然许多人可能博学聪慧,但现实的结果却是,除了一些在研究方法上提供指导的手册之外,绝大多数论述历史学的著作由如下人士撰写:研究历史思想的哲学家,以史学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史学者,以及偶尔为自己的行动(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辩护的史学家。本书力图避开最后一种类型,忽略第二种类型,同时也不会妄称模仿第一种类型。本书体现了历史研究和写作本身是正当的这一假定,同时对如下这种怀疑做出反思:对历史知识的现实性或者历史思想的本质这些问题的哲学关怀会妨碍历史学的实践。当我阅读到这些讨论——历史学家如何思考、他们如何能够宣称有权利去描述不再存在的事物,或者历史事实是否不依赖关注事实的思想家而存在——时,我对这些作家的创造力感到震惊,因为他们通常是这么一些人:很显然,他们从未试着去做历史研究这项工作,从未留意过去的事实和事件的显然存在的证据,或者从未对历史材料(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头脑)做出批判性的判断。^①虽然我读过论述这些问题的许多作品,但是我并不打算进行详尽的或者综合性的研究。我想做的就是记录一些经验——我自己在历史研究、写作和教学中所获得的经验。与其说这是一

VII

VIII

^① 我并没有否认有些论述这些主题的作品富有判断力,例如,W. H.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51); P. 加德纳:《历史解释的性质》(P.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1952); W. B. 加利:《哲学与历史理解》(W.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1964)。每一期新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都倾向于发表新的力图为历史学提供哲学基础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认为它们并没有促进历史写作。



篇专论,不如说是一篇宣言,更多的是对于一位工作中的史学工作者的信念和实践的解释,而不是具有一系列定论的系统分析。当然,我知道自己的经验有限,例如,我的例子似乎选自历史的一小部分。然而,我极力铭记的是:有大量的历史是我所不知的,也有许多历史研究方法我无缘加以实践,成功之路从来就不只一条。

我知道,我必须说出来的话有时候似乎是攻击性的,我只能希望人们相信我的如下说法:我努力批评那些为我所认可的名家,而且只是就事论事。通过向他人寻求友好的支持和帮助的方式,来减轻一个人对一篇宣言的个人责任是很不恰当的,我不会这么做。不过我必须感谢那些在这些年里耐心而批判性地倾听我的毁谤的人;我想表达我对悉尼大学出版社的感激之情,尤其要感谢迈克尔·特恩布尔(Michael Turnbull)先生,他不但建议我写这部书,而且自始至终鼓励我,并且提供了非常不错的建议。作者们通常对编辑没有什么好感,不过这次是例外。

G. R. 埃尔顿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

1966 年 12 月

目 录

序 言/ I

第一章 目 的/1

当前的争论/1

自 治 /7

类 型/ 11

竞争者/19

目 的/33

第二章 研 究/43

历史真理的可能性/43

事实与方法/49

原始资料/55

证据与批评/61

想 象/70

第三章 写 作/74

控 制/76

模式与偏见/80

风 格/88

听 众/97

范 畴/100

篇 幅/104

分析与叙述/107



目 录

第四章 教 学/120

本科生教学——教什么？ /123

本科生教学——如何教？ /135

研究生/143

编后记/150

索 引/191

译后记/203

第一章

目 的

当前的争论

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然而,我们必须做出区分。虽然创世神话和宇宙起源论证明了赋予过去以意义这一普遍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于理解和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现代文明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因为它依赖的是自然科学和分析的历史学(analytical history)这两大智识支柱。与 20 世纪的这些特征鲜明的思想体系(它们意义非凡,在 17 世纪开始联手统治)相比,神学和哲学能够宣称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主宰了人类的心智。它们的胜利——现在是普遍性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形势的结果,因为政治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它们使得欧洲在文明的竞争中胜出)将一个社会组织推向了发展的顶峰,而这一社会的思想又是在对于过去的真切关怀这种最悠久的传统的影响之下的。在印度和中国的古典思想中,存在某种显然是非历史的态度。而作为另一棵重要的智识之树之根基的希腊和犹太传统,是所有史学史的书写都应该关注的。没有其他古老神圣的作品比《旧约全书》更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和历史性,它是对上帝(他掌握着历史中前后相继的各代人的命运)之言行的直接记录;在各种宗教中,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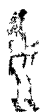


基督的后代从一个历史事件中获得它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人类事物的系统研究(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始于希腊人。世界各地一直都在研究和写作某种历史,例如,从埃及和秘鲁的编年史到爱斯基摩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但是,只有在回溯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文明中,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关怀、一位未来的老师、一种宗教的基础以及一种解释人类的存在和目的的有用之物。即使在那里,它当前的身份也刚确立不久。

作为一门十分发展的学科而言,历史研究确实非常年轻,比医学、法律、哲学、神学甚至自然科学都要年轻许多。阿伽门农之前还有英雄(*Ante Agamemnona*)——在尼布尔和兰克之前的确有伟人存在,但是,那时的历史学家既不是人数众多也不是引人注目。希罗多德可能是历史之父,但是,在许多世纪中,他的弟子并非人数众多、绵延不绝。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李维、萨卢斯特(*Sallust*)以及塔西佗——这些都是伟大的名字,然而,对于 600 年的时间而言,这并非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位没有受到人们批评的人似乎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指出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偶尔超越他们的编年史,进行反思和详尽的解释,^①迄今为止,我们都听说过伊本·卡尔东(*Ibn Khaldoun*)。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布鲁尼、马基雅维利、奎西阿迪尼(*Guicciardini*)——受到的颂扬多于阅读,还有一些人会把弗朗西斯·培根称为历史学家,他们的依据是他的那篇完全不可信、然而才华横溢的报刊文章《亨利七世》。事实上,向严肃的历史研究迈出有目的的第一步是在 17 世纪。马比荣(*Mabillon*)和博兰德会(*the Bollandists*)建立了史料批判学;在英国,斯佩尔曼(*Spelman*)、塞尔登(*Selden*)和布雷迪(*Brady*)撰写了现代专业人士可以承认的作品;万利(*Wanley*)和马多克斯(*Maddox*)从过去的真实遗迹着手来研究过去;稍晚一些,哥廷根学派也提出这种观点,并

3

^① V H 加尔布雷思《中世纪英国的历史研究》(V H Galbraith, *Historical Research in Medieval England*, Creighton Lecture London, 1951)。



且把这种首创精神引入德国。^①依靠人文主义者所取得的进步,这些人赋予历史学如下权利:把自身视为一种独立的探究形式,为自身的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以及遵循自身关于证据和目的的法则。他们寻找原因,在似乎毫无意义的事件序列中寻找关系链,也许他们是一种粗鄙的机械论者,但他们也在教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了一种世俗意义。

尽管存在这些通常是引人瞩目的成就,但科学的、有规则的 and 系统的历史研究确实只是始于 19 世纪,因为只有在这时候,历史学家才吸取古物收集者(antiquarian)的教训,并且充分发展了一些技巧,这些技巧使他们能够反击如下常见的指控:他们对过去的重建只是一个神话,非常有趣并且极具教导意义,但缺乏严谨性、确定性或者真理性。约翰逊博士虽然意识到历史事实可能是可以认识的,但他不可能相信“我们在历史中发现的人物,除非他们是由熟悉他们的人所描述的”;凯瑟琳·莫兰(Catherine Morland)无法理解她对历史的厌倦,尽管“在历史书里,必定有大量的内容是创造出来的……而在其他书籍中,创造是令她感到愉悦的事情”。过了 50 年之后,历史的写作是在系统研究基础之上进行的。尽管结果可能依然(对塞缪尔·约翰逊而言)在道德上是令人生厌的,可能依然会让莫兰女士感到厌倦,但原因却有所不同了。经过验证的确定性取代了发明、幻想和刻画人物,问题意识取代了不下定论。

与更早时代关注历史的那些更伟大的人物和更有能力的人相比,优秀的现代史学家更为出色,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这么说并不是自高自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们有机会成为更出色的学者。对精通文学的人而言,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可能是克拉林顿(Clarendon)、吉本(Gibb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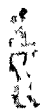
^① M D 诺尔斯《伟大的历史事业》(M D Knowles, *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 Edinburgh, 1963), F S 富斯纳《历史的革命》(F Smith Fussner,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London, 1962), J G A 波考克《古代政制与封建法》(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1957), D C 道格拉斯《1660—1730 年间英国的学者》(D C Douglas, *English Scholars, 1660 1730*, London, 1939), L 福克斯编《16 和 17 世纪英国的历史知识》(L Fox, ed., *English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1956), H 巴特菲尔德《人类论往事》(H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1955)。



和麦考莱 (Macaulay), 尽管现在几乎很少有人再阅读他们的作品, 而且他们作品的可读性是其声名显赫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 他们值得阅读, 而且也写出了上乘佳作, 但是, 他们是在旧时代进行创作的, 因此缺乏我们这些显然更不起眼的人所享有的机会。对研究历史学的人而言, 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是梅特兰 (Maitland) 和纳米尔 (Namier), 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必须马上补充的是, 这一点并不是人们钦佩他们的原因, 应该说, 对他们的钦佩因为这一缺陷而打了折扣。知识或者理解动机的能力不足以成就真正的历史学家; 如果以此为基础, 那么古老的三位一体的圣人无疑胜过许多优秀的现代人。区别在于, 真正的历史学家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科学的和智力的研究, 从中得到训练。藉此, 历史研究中有了不同的态度和目的。

因此, 不足为怪的是, 在那一文明完全支配标准和信念的情形下, 历史研究在最近 300 年呈现为一种重要智识产业的形象。当今写作的历史著作的数量 (更不用说还有那些虽然受到研究但并未被撰写出来的历史), 以及以各种方式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数, 随着社会趋向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而且, 与每一种优秀的服务行业一样, 历史学可以提供某种产品, 适合所有人。除了满足多数人需求的批量生产的工厂, 还有只为少数人干活的个体的工匠。所有迹象都是欣欣向荣的。大学的历史院系招满了学生, 历史教师们摩肩擦踵, 他们甚至可以从前提出得出结论。出版者争先恐后地追逐历史学家, 甚至那些学院式的历史学家最终也认识到, 他们拥有一种适于销售的日用品, 无须对出版者的支票感到如此敬畏。丛书成倍增长。整个行业开始显示出火爆的迹象, 狂热的生产导致了质量的下降, 而价格却上涨, 甚至因为意识到好景不长而出现了更值得重视的警示。事实上, 这些征兆说明, 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信心的危机, 而这种危机将会导致行业的萧条。随处都可能会碰到非理性的审查; 实践的历史学家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道德劝诫专家和厄运预言家的困扰。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不成系统的争论本身就是生命活力的迹象,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 生命通常也包含了偶尔的疾病或者畸形。所有这些疑



虑和警示,并没有提出很多新东西。许多批评家要求,历史学家不要躲在他们的阁楼和书房里,应该走出来,为营造一种普遍的智识氛围而发挥作用;但是,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只是在重复伏尔泰和18世纪那些批评古物收集者、贬低其研究的哲学化的历史学家的论调呢?^①那些鼓吹统计学、社会学或者其他“科学”的方法之优点的人,只不过是重新激活了一个令人厌倦的论题: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间隔时间是如此之短,让人无法原谅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无知。^②由于历史学的材料必然是局部的,而且出自个人头脑的产物更加是局部的,因此,历史学过去一直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它们会造成争论,招致讽刺,引发敌对观点的著述。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开端之处就已经有了所有这些争论的原型呢?——当历史学几乎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修昔底德就在抨击希罗多德的方法和目的了。有历史写作,就有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这就好比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很早以前所有可能的立场都已提出来了,在漫长的争议过程中,只是被反复地重复而已。

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一直想知道他们为何做这件事,亦即他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延缓了问题的解决:人们为何会对过去感兴趣,尤其是他们为何会饶有兴趣地致力于这样一种智识生活,或是供养一些人来这么做呢?为什么社会应该甘愿供养历史学家,这一问题随之产生了一个系论:历史学家应当做些什么,来向社会证明他们的存在的正当性呢?简单地回答说,历史研究和写作是令人愉悦的职业,它让从业者感到满足,并且不会伤害别人;这不但太过于狭隘自私,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① 参见 A D 莫米格里亚诺《史学史研究》(A D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66, 1ff)。记住下面的事情或许显得刻薄:当他们被发现极度缺乏知识的时候,那些哲学史家的主张失效了。

^② 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问题。它两者都是。但是它一直就是一门艺术,科学的增加(这是最近150年的工作)已经把它转变成某种新事物,与人类的理性这种最高级的能力相称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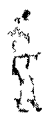


历史作品能够造成危害；它们已经造成过危害；所有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应该不时扪心自问，他怀抱的目的是否超越了仅仅是为了自我满足。

6

问题或许是永恒的，而答案却会花样翻新，在通常可以预见的对盛极一时的主导理论的反动中相互否定。由于历史学家天生就语言尖锐，因而，在局外人看来，争论很可能显得粗野无比：历史研究不仅仅在智力优势方面证明了自己对中世纪神学的取代。然而，人们完全可以要求那些主张关注事物和观念的长期发展的人稍微具备一点洞察力。因此，当一位现在刚好三十出头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20 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一时之间迷失了方向”——原因在于，政治的和宪法的当务之急（当英国统治世界时，它是合适的）不再有效，同时又没有其他事物取而代之^①——我们应当向他温和地指出，他完全没有从一种合适的、历史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因此，许多他归之于混乱和智识贫乏的优秀史学家，事实上正好没有持一些流行于今日的信念。他们并非必然认为历史研究中只有社会分析才有价值，总体而言，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通过论及对社会的某种非智识的影响来证明他们工作的正当性。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原则和信条，与他们的批评者所宣扬的原则和信条一样，它们也是明确的、具有潜在限制性的。在英国历史学家当中，支配 20 世纪前半期的信念就是：令人钦佩的历史编撰学的原则能够被简化为一个主要的规则——为历史而历史。虽然这一严厉的规则可能而且的确制造了大量狭隘的沉闷乏味之物，但是，它也塑造了一些有关历史学家之卓越技艺的丰碑。迄今为止，那些反对它的人所撰写的历史是否有如此坚实的基础、是否如此谨慎地追求真理、是否如此不受成见和现存答案的影响，这些绝不是一目了然的。就目前而言，他们这么做的可能性难以判断，因为在多年的宣言和偶尔的学术文章之后，他们所完成的、可以辨认的成就依然少得

① 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的文章(*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 April 1966, 275)。整篇文章——事实上是整个问题(被称为“史学新方法”，这篇文章是它的组成部分)——充满了一种迷人的傲慢以及从历史观点而言无效的断言。但是，它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会再次提到它。



可怜。

然而,如下两种情况——争论可能变得多余以及它们通常只是热衷于回应过去所提论点——都不会使人们认为合适的治疗就是沉默。争论是必需的,即使最枯燥的争论也并非毫无价值。与所有那些从事具体科学的人一样,历史学家始终处于满足于长期而枯燥的工作的危险之中。争论的时代是清点存货(stock-taking)的时代;它导向一种必不可少的目的和原则的再塑;虽然答案从来不会变得真正新颖,但是,它们可以提供新的理解和积累新的洞察力,这些对于历史的真正目的以及历史研究与写作不无帮助。晚近持续爆发的自我怀疑、泛滥的批评和万能药处方,伴随着许多肤浅的叫嚣、对错误神灵的狂热追求以及许多草率的断言(它们关乎令人怀疑的品位和标准)。但是,这些缺陷并没有使它丧失基本的正当性:它抨击一种可能会变成愚笨无知的洋洋自得。然而,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恰当的时机去做如下事情:重申一些关于实践和经验的真理;把历史学从它的率直的朋友那里拯救出来;以及提醒历史世界一些事情——工作有待完成而不是提倡,那种工作必须在明确的、不可避免的情形所确定的范围内进行,聪明的想法(不管看起来多么新颖)并非一切。

在这一章中,我将关注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有必要再次询问历史学是否具有独立于其他研究形式的身份:历史学是作为一种智识追求而存在吗?它能够宣称拥有自身的规则和原则吗?或者,它仅仅是各种其他的“社会科学”的旅行袋吗?其次,由此而来的是,必须考察它与同源学科的适当关系。最后,我会为如下问题提供我自己的答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自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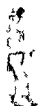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所说、所思、所做和所经历的一切事物。许多都是平凡之事,但又不尽然;必须有所保留。首先,并非所有的过去都



是可以恢复的,历史研究必然局限于过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证据要么保留了下来,要么可以在头脑中重建。换言之,历史或许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过去的整个生活,事实上,它只相当于继续存在的过去。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与人们可能认为的保留相比,这确实是一种限制更少的保留,因为过去所保留下来的痕迹并不局限于残存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证据可能在它似乎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被发现,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毫无知识的、思维活跃的人喜欢指控历史学家提出一些错误的问题或者处理一些索然无味的问题。君王和政治史、战争和外交史通常被宣称是乏味的和不充分的;我们为何没有更多地听说“普通民众”、穷人的生活以及“社会”整体呢?这种指责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当确实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证据的时候才如此。如果没有证据,那么历史学家的桌案上就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过去已经完结和完成,它不可能被复活。它可以被重建——再次得到观察和理解——如果它正好留下了当前的问题。

其次,已知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宽泛,因为历史学并非是处理人类过去生活的唯一探究形式。一切所谓的社会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都关注人,它们都可以关注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与如下事实是格格不入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从来都不可能考虑现在,在被考虑的瞬间,现在就变成了过去。这些学科显然是自治的,它们涉及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对它们自己而言都是特殊的。历史学

9 在这一意义上是自治的吗?它到底是一种专门的探究形式呢,或者仅仅是适用于这些学科的一种精神状态?社会学家尤其有可能坚持这种观点。我曾经听到他们中的一位声称对过去的研究是多余的,因为社会学分析所获得的对当前的真正理解,使人们能够推知和解释过去。(他似



乎不像在开玩笑)不过,社会学家的傲慢倾向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他们偶尔可能获得某种并非一目了然的真理(并非只有历史探究才能发现)。因此,我们必须询问历史学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的差别何在,如果那种差别不在于它对过去的关注的话。答案存在于历史学所特有的三种习性当中:它对事件的关注;它对变化的关注以及它对特殊之物的关注。

历史学处理的是事件而不是状态,它研究发生之事而不是现存的事物。与此相反,例如,考古学只能揭示和描述状态、情形和环境,这些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症状;它无法处理生活的事实(它是运动)。考古学的各阶段发展不平稳,同时没有对运动做出描述或解释,变化是渐进的(无法鉴定时代的)——通常都如此——还是灾难性的都无关紧要。当考古学家试图将事件纳入他的分析的时候,他要么必须把自己局限于基本上相当于状态描述的纯粹事实(“这个场所为大火所毁”),要么诉诸历史的陈述,这种陈述并非来自他的考古学证据和方法,如果他正在研究一个无法做出历史说明的时期,那么这种陈述很可能是完全虚构的。另一方面,人类学和社会学可能充分地显示出了对事件——割礼或婚嫁、学校的修建或观点的形成——的兴趣,但是,这并不是为了事件的原因,而是为了从动态的因素中提炼静态的结论。历史学家可以完全沉迷于事物的状态、社会的状况以及思想体系和政府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中。但是,如果他打算历史地理解并且从事历史著述的话,他必须把这种分析当作事件链中的步骤,当作解释一系列偶发事件的问题来加以思考。他必须专注于理解变化,变化是历史分析和描述的本质内容。历史学基本上处理事物(人们、制度和观念等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事件是它的关注点,同时也是它的工具。把因果关系当作历史学的主要内容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普遍原则(即历史学处理 a 状态向 b 状态的运动)的一个特例。如果说 a 导致了 b,那么这种关系恰好是因果关系;如果 a 和 b 是通过巧合、共存或者纯粹暂时的顺序而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也完全是历史性的,所有的关系通常都能够在历史学中碰到,不管它们在智识上是多么无法令人满意



至于历史学对特殊之物的关注,必须恰当地加以理解。人们常常声称历史方法的特征在于把事实或事件当作独一无二的。但是,频繁的断言并不会创造真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并没有历史学家真正地把一切事实当作是独一无二的;他把它们当作特殊的。他不可能——没有人能够——处理独一无二的事实,因为事实和事件在获得意义之前,需要参考共同的经验、传统的结构以及(简而言之)普遍之物。独一无二的事件是一种怪诞的想法和一种挫败;如果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在意义或含义方面永远无法再现,那么它就缺乏一切可以衡量的标准,因而也无法加以评价。但是,对历史学家而言,事实和事件(以及人民)必须是个别的和特殊的:如同类型相似的其他实体,但是永远不会与它们完全同一。换言之,它们被视为具有自身的特征,而不是被视为方程式中无法区别的统计学单位或要素。但是,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密切的关系、共同之处和普遍特性(体现在不同的比例和排列中)而变得易于理解。历史事件如同现代物理学家的原子,这种原子由可分析和可重复的成分构成,但是,如此的构成使得它自身很复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知的;它也不同于牛顿的原子或者莱布尼茨的单子(一种基本的、同一的物质单元)。这就是历史事实是独一无二的这一错误断言的含义,人们可能察觉到,从实践的目的而言,这一错误看起来很像真理。但是,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在理解了真正的定义之后,才可能对过去的复杂性做出合理的分析,同时避免社会科学的标准化错误。

现在我们可以改述早先对历史学的定义。它关注人类所说、所做、所思和所经历的一切,这些发生于过去,并且留下了当前的遗迹;它从发生、变化和特殊之物的角度来处理它们。由于没有其他的对人类经历的分析符合这一定义,历史学的自治——它区别于其他同类学科的权利——因此得以确立。